

贝克文集

主编：薛晓源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主义的曲解 — 应对全球化

Was ist Globalisierung?

Irrtümer des Globalismus - Antworten auf Globalisierung

(德) 乌尔里希·贝克 著

常和芳 译

吴志成 校

贝克文集

主编：薛晓源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主义的曲解 — 应对全球化

Was ist Globalisierung?

Irrtümer des Globalismus - Antworten auf Globalisierung

(德) 乌尔里希·贝克 著

常和芳 译

吴志成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全球化? / (德)贝克著;常和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贝克文集)

ISBN 978-7-5617-6216-5

I. 什… II. ①贝…②常… III. 全球化-研究 IV. D8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5317 号

Was ist Globalisierung?

Ulrich Beck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5-544 号

贝克文集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

撰 著 [德]乌尔里希·贝克
译 者 常和芳
审 校 吴志成
责任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夏海涵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童 话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78 16 开

印 张 12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216-5/C·178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代序：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研究

一、全球化：我们所在世界的知识语境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联系和交往在迅猛加强。全球化现象凸现于世，全球化成为最时髦的词语，在全世界主流媒体上不断出现、在大多数人的嘴边流动。随着全球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快速渗透，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呈现出来，美国左翼学者爱德华·赫尔曼认为：“全球化迄今带来了生产力的衰退、社会的灾难和对稳定的威胁”；“全球化是对民主发动的进攻……”^①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②不管人们是欢呼还是咒骂全球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全球化就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关照、介入现实的新工具。他指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全球化就是时空压缩，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德国教育部副部长格尔茨对全球

^① (美)爱德华·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薛晓源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②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化的过程和本质体认尤深，他认为全球化使这个社会成为突然加速的社会。^①关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西方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左翼学者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和策划的。我们认为这样评判全球化本质属性，虽然有犀利的批判性，但是太简单化。历史发展结果是许多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多种合力进行多向度交融而产生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有着强力意志的某些国家独自驾驭的结果。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的倡导者乌尔里希·贝克在1998年出版的《什么是全球化？》一书指出：“全球化既是一种新知识的象征，同时它本身也是经验文化。这种历史经验的传播通过现代信息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的行为展望和远景预期。”

2004年11月我在德国波恩大学做访问学者，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采访贝克教授，询问6年之后，面对世界风云变幻的今天，如何看待全球化。贝克教授说：“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无疑是各学科讨论的焦点，是学术界研究的核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全球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动态的、‘一种正在运动中的发展过程’的名词。全球化相对于全球性或全球主义而言，更多强调的是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跨国家、跨文化的相互关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因此，全球化是一个沟通相互不同的原点的语言桥梁。其全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非线性的过程，而在于它可能指明了一些已然形成的、经验的、历史的、多样的过程。”

二、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西方有关学者在反思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9·11”恐怖事件之后，认为风险不是只拘囿于某一地区或领域，全球化的快速进程把风险带到

^① Peter Glot, *Die beschleunigte Gesellschaft*, 1999, verlegt bei Kindler.

世界各地,风险社会已经转型成为全球风险社会。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风险社会理论是对未来世界也是对现实世界将可能存在和业已存在的“社会疾病”经过详细的了解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诊断性结论。比较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最大差异,贝克睿智地拈出人类普遍的情感反应:“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则可以用另一句来概括:我怕!”贝克说:“我们的世界是个世界风险社会。必须将它理解为这样一种现实,它进行自我侵害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根据贝克的理论以及风险社会理论在西方的最新发展,我们可以把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概括为:1. 现代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源自人类对自然与科技完美的幻想。在今天,科技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人类对科学宗教般的虔诚,使生产到消费的链条中呈现了高度不确定性。2. 现代风险表现为显现的时间滞后性。我们总是在风险转化成危险或者事实的时候,才意识到风险的存在。3. 现代风险的发作具有突发性。风险的积累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把握风险从量变到质变的度尤为困难,渐变与突变是风险发作的形式,生态脆弱以及人类对地球疯狂掠夺速度,促使风险呈现形式多为突变的形式。4. 现代风险具有超越常规性(因为科技的应用所带来的损害往往大于其功能)。风险的呈报形式随着科技形式的千变万化,而使人感觉到迷途和困惑。5. 现代风险具有超常的传染性。随着全球化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频繁交往和社会安全的幻觉使风险具有超常的传染性。6. 现代风险的传播与渗透具有全球性。从“9·11”事件之后,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盛行,并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进入泛滥期。7. 现代风险具有人们无法回避的临近性。城市拥挤、居住空间的狭小、避难场所的缺失,人们在面对风险时所表现出的慌乱无措和相互影响,都使风险具有

无法回避的临近性。

由于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使专家在面临新科学技术时，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或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以至于人们在开始使用科技时，就已经为风险埋下了发作的种子。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任何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广泛影响性（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危害的全球性（因为现代风险的危害已远远逾越了现代工业所内含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疆域边界的逻辑），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个别的民族政府来承担。

贝克对现代社会里技术安全神话的塑造和迷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探讨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前景。与阶级社会的“平等”理想不同，风险社会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出于恐惧的心理而不断走向联合：“焦虑的共同性替代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成标示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转化而来的联合。”

三、风险社会与中国

2003年在北京肆虐的非典型肺炎，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以及在几个省流行的禽流感事件，都展现一个事实：风险社会对中国而言并不遥远。关于风险社会与中国的问题，我在德国与贝克教授进行了学术对话，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贝克教授认为，造成安全风险的原因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其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的人为破坏及严重的不负责任，为风险发作埋下了种子。其三，社会发展

失衡对城市本身构成巨大的威胁。我当时就对贝克教授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的论断提出质疑。他说他这一观点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是他还坚持这么认为。我请他说出坚持的理由。贝克教授说:中国正在全面迈向现代化,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西方两三百年的现代化里程,期间社会转型的痛苦、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宛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快吃一盒压缩饼干,短时间可能还尚无饱意,但不久肠胃胀痛与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就是社会学常说的“压缩饼干”理论,考察西方社会的古今,概莫能外。我援引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诗作“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可能”进行反驳。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虽然局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开始倡导科学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努力化解社会和经济风险。贝克教授颌首微笑表示接受我的解释。

四、风险社会及其解决之道

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当中提出以症候去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发现马克思未曾言明的东西,从而把握资本主义运行的规律。阿尔都塞认为,要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通过反复阅读去发现马克思在文字表述背后的心理过程,他把这种研究方法称作症候阅读法,即,如同从病人的病情症候去寻找病因一样,通过把握马克思主要著作的文字、概念去挖掘著作深处的理论动因——无意识动因。该方法完全适用于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我们可以借用“症候”这个术语及其研究方法去研究风险社会,从而发现风险世界当中未曾显现的症候和先兆,最终把握先机。我们因此提出风险症候学。

我们知道,国际上在研究和测评贫富差距上有基尼指数,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有GDP和GNP,我们是否能联合环境专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一起研究合作设计和建构风险社会年度指数?

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是短时间里就能完成的。

五、全球化语境下风险社会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在全面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入研究和探讨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理论，尤其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理论对我们理解风险、认识风险、化解风险、超越风险，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语境和知识话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借鉴吸收，将对构建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

1. 全球化加速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风险意识。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名著《存在与时间》里，在论及常人对死亡态度时说：常人总是认为死亡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其实死亡是每个个体不可逃逸的天命。常人对死亡态度与对风险态度非常相似。人们总是认为风险是遥不可及的未来，风险是别人的风险，与自己关系不大。其实，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日益的泛化和深度扩张，风险随时随地发生的几率在增高，风险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2. 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反思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以理性主义为依托的现代性，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贝克教授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中提出了第二次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与第一次现代性一样，均重视人的理性；但第二次现代性更注重现代性的解构问题，且更强调多元性与不确定性。因此，贝克认为，由于共识的超越性、价值的整合性、利益的同一性及对制度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造成民族、国家、意识的解体，从而引发了众多问题。所以，现实社会应该寻求一个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寻求“反思的现代性”，在这个新的社会整合当中必然要存在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逻辑。

3. 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责任意识。今天大多数的人都可以通过

媒体看到或觉察到“风险”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知道,甚至全然不知风险的严重性,有的甚至为风险的存在而兴奋。因此“风险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主张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们要求行动者不仅对他人或对集体都应以“责任原则”衡量自己的作为,还必须为下一代负责,这种精神与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或许这预示着伦理必然要攀登现代性的高峰,以此彰显“社会性”的一面。

4. 风险的治理要建构合作意识。风险社会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在风险治理的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社会、伦理和价值等因素,而不能仅仅以简单的因果思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进行决策,因此它更是决策意识文化。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民族内部平台,在各民族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如预警灾害通报)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

5. 在全球化的语境要树立前瞻意识。风险社会理论建构的就是面向未来,探询和预见未来的不可预见性。风险社会理论既不是江湖的算命先生,能预测未来,也不是摇唇鼓舌的骗子,危言耸听。风险社会理论站在当代环境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整合的前沿,对人类社会可能出现的危机提出科学的分析和诊断,以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薛晓源

译者序

20世纪90年代末,当人们对“全球化究竟是什么”还深感困惑时,全球化作为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已经深入到了世界各个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面对全球化,特别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及社会后果,人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动:许多人趋利避害,积极应对;也有人感到极大的恐慌并且对此束手无策。那么什么是全球化?它包括哪些领域?究竟如何应对全球化?针对这些问题,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Ulrich Beck)在《什么是全球化?》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乌尔里希·贝克是慕尼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思维活跃,著述颇丰。在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他创立了全球化社会学,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化”等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概念,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有《什么是全球化?》、《风险社会》、《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世界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修正》、《自由之子》、《反思性现代化》、《全球化的政治》和《世界社会的前景》等。在全球化视角下,贝克通过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等有关思想,对德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导论。在导论中作者首先指出全球化改变了一切,它预示着新的政治的爆发。因为一场争夺民族国家物质生活命脉的行动已悄然进行。世界社会作为多领域全球化的后果正在限制、破坏民族国家的发展。民族国家失去了征税监控权,由此产生

了大量虚拟的纳税人,这些人在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却逃避了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在世界经济和个性化之间,民族国家社会聚合力在下降,社会丧失了集体自信心,从而也丧失了政治行动能力。民族国家第一次现代化模式,即文化身份(“民族”)和领土以及国家相统一,受到了质疑。贝克认为,只有明确区分全球主义、全球性和全球化概念,才能打破统治人们思想并阻碍人们行动的世界市场观念。

贝克把全球主义描述为世界市场,即世界市场统治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排挤或代替政治行动的思想观点。这种思想强调一维经济关系,把多领域全球化简化为一维经济领域全球化,同时这一维领域还是单向发展。全球主义的思想核心在于消灭第一次现代化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全球主义认为,领导诸如德国这样一个综合体系应该像领导一个企业一样。从这个意义看这就是经济帝国主义,由此企业就要求制定有利于实现其目标的总框架。

全球性是指,我们早就生活在世界社会里,也就是说相互封闭的领土认识越来越模糊,任何国家、任何团体都不能相互隔绝。因此,各种经济、文化和政治形式相互碰撞,这一切必须重新自我辩护,也包括西方模式。“世界社会”指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各种关系没有被整合到民族国家的政治范畴或由政治决定,其中民族国家大众媒体策划的自我认识起重要作用,因此,为了确定重要的政治行动标准,狭义的世界社会就是已感觉的、反思的世界社会。

在“世界—社会”这一词组中,“世界”指差别、多样性,而“社会”指非整体性,因而人们把世界社会理解为非统一体的多样性。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为前提:跨国生产方式和劳动市场竞争、全球媒体报道、跨国买方抵制、跨国生活方式、“全球”关注的危机和战争、核能的军事及民事应用、大自然的破坏等。

与此相反,全球化指这些发展过程,其结果是各民族国家及其主权遭到跨国行为体、它们的权利机遇、方针取向及网络的认同和破坏,并且被横向联系起来。全球化也指非世界国家,更确切地说,指无世界国家

和无世界政府的世界社会。

在明确区分了全球主义、全球性和全球化三个概念之后,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什么是全球化?——领域、分歧及其界定”。全球化是过去和未来数年里使用(滥用)最多、界定最少、最容易被误解、最模糊并且政治上最有影响的(标语和有争议的)词语。因此,区分全球化通讯技术、生态、经济、劳动组织、文化、市民社会等不同领域是十分必要的。

要想界定全球化概念,首先要推翻第一次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也就是打破在封闭的相互隔绝的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族社会领域里生活和行动的观念。全球化指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文化冲突和公民社会各领域里可感受的日常行为的去除疆界性。全球化是既熟悉又无法理解和难以理解的事物,那种可感受到的力量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它迫使所有的人适应它并且面对它。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冲破”了疆界,好像这些疆界根本不存在。甚至那些被政府拦截在本国外的物品、人员和思想(毒品、非法移民、批评损害人权),也都找到了入境的途径。这样理解的全球化意味着消灭距离,人们被卷入到并不希望的、无法理解的跨国生活方式中。

按照社会集装箱理论,社会以“国家控制地域”为前提条件。从定义上看,社会隶属于国家,社会是国家社会,社会秩序意味着国家秩序。国家作为一个“集装箱”首先规定了领土单位,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及社会进程和形势进行系统统计。民族国家被视为相互隔绝的有秩序的社会,这样的思想和研究排斥所有介于内、外制度范畴之间的一切。

跨国社会领域瓦解了社会与地域选择之间的相互联系。跨国社会领域思想及其研究理论指出,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第三种情况:此一即一彼以及既一又关系的社会生活和行动。在被隔绝的有秩序的世界里以及世界之间形成了连接并且改变了本国和移民国的“社会面貌”。例如,在北美墨西哥人和本国墨西哥人之间形成的跨国社会、跨国生活与政治形式。

在全球化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不同逻辑的理论。一些学者强调存

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另一些学者则研究反映全球化各种复杂原因的逻辑理论。如果尝试着把一种逻辑置于中心地位，其结果是全球化只有一个核心领域；但如果平等对待全球化各种相互排斥的逻辑，那么就会发现全球化的各种分逻辑相互对抗。

把一个特殊领域和逻辑解释为核心领域和逻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罗西瑙(James Rosenau)、吉尔平(Gilpin)、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以及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对于他来说，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发展动力。与他不同，罗西瑙、吉尔平和赫尔德则从事国际政治研究。他们一方面通过提高信息技术全球化的意义(知识和信息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各种政治—军事因素和立场(权利—政治)从而对民族国家的正统观念提出了质疑。

罗伯逊、阿帕杜莱、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费瑟斯通(Featherstone)、斯科特·拉施(Scott Lash)、尤利(John Urry)等理论家用传统的文化理论观点进行论证。他们坚决反对普遍流行的世界麦当劳化观点。文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将成为单一文化世界。相反，全球化指“全球地方化”，即无论内容还是各种结果都是极其矛盾的发展过程。最终出现两种结果：全球富有和地方贫困以及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

这些理论家认为，经济领域、技术领域、国际政治领域、生态领域、文化领域等一维领域以及世界文化产业或新的大规模社会不平等领域是全球化的起因和后果。各种观点相互影响，由此产生了全球化多元社会学。

在经济、政治、生态、文化和个人经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社会各领域及身份认同、行为与生活体系不断瓦解，从而产生了跨国社会的权利机遇、行动、生活及认知领域。跨国多地生活推动了个人生活经历全球化，而个人生活经历全球化表明世界的对立矛盾不仅发生在外部世界，也发生在个人生活中心。

此外,贝克通过介绍、比较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社会观点,阐明了世界社会的不可修正性。他指出,跨国国家方案可能是一种应对全球化的方案。跨国国家方案的基本观点是,为了保障内政、地理政治以及政治权力,同时为了从政治领域发展全球化过程并从跨国领域调控它,民族国家模式虽然过时了,但还不能放弃。跨国国家是强国,其政治发展力量是建立在它们共同应对全球化的基础上。跨国国家模式是一种中间、混合模式,那些按以往方式理解的似乎相互排斥的基本特征在跨国国家里顺利地重新组合、融合。因为跨国国家是非民族国家、非领土主权国家,因此跨国国家被理解为唯一反对国家和社会集装箱理论的对立模式。虽然跨国国家模式否定民族国家,但肯定国家概念。它对国家的认识摆脱了民族国家领土意义的局限性并为新的国家概念拓展了空间,它认识到多领域全球性的不可修正性本质,它不仅从国家意义,而且也从公民社会意义上使跨国规定和组织成为重新规定和恢复政治的基础。跨国国家也不是国际民族国家或超民族国家(区域性世界国家),因为在超民族国家体制内形成国际组织、多边主义或多领域政治模式的基础仍然是民族国家,由此它被理解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在跨国国家理论中政治协调机制不再依赖民族国家相互隔绝与对抗关系,而是沿全球化—地方化坐标运行。跨国国家是全球地方国家,按照相容区分原则它们被视为世界社会的省份,由此在世界市场、多元世界政治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

从跨国政治认识意义看,全球化被理解为政治化,即世界社会责任成为重新定位、重新组织政治领域的基础。由此人们被动地放弃两项民族国家理论原则:国家与社会的等同,国家与社会特有的领土关系。此外,国家一意孤行将毁灭国家政治,而跨国合作将使国家政治充满生机,由此跨国国家的基本框架发生了根本改变,即从民族—民族转向全球—地方。

跨国也指跨文化。其前提条件是跨国国家承认国家和世界社会的非同一性——这对文化自我认识有什么意义?如果世界社会是没有统

一体的多样化,而民族国家是多样化有限的统一体,那么跨国国家就是特定的多样化。这就意味着,不考虑全球化和地方化,各种全球地方文化形式在世界社会关系中得到体验和承认。通过这种方式全球—地方坐标也扩大到地方—地方坐标。

此外,人们还必须认识到跨国国家集中和分裂的同时性。各种跨国行为体不仅得到认可,而且还开始承担政治责任和义务。为了发掘政治和社会政治的潜力,跨国国家必须堵住税收政策漏洞。民族国家放弃主权和自主权,从而使更高权力机关达到相应权利集中的目的。由此分割主权被视为零和游戏并且不断推行,当一方必须放弃某些权力时,另一超民族国家机构的权力就由此而扩大。与此相反,跨国国家思想被理解为利润游戏。通过合作获得更多的主权,并且这要对跨国权力集中和相联的地方、国家两者都有利。跨国国家不仅必须与其他区域以及世界社会权威,而且还要与次国家、亚民族权威分享公民的忠诚。

在第三部分“全球主义的曲解”中,贝克指出,只有坚决批判全球主义,才能赢得政治发展空间和政治优先权。新的简单的全球主义被理解为排挤一切、改变一切的世界市场统治思想,因此必须把它从复杂的全球性中区分出来。贝克对全球主义十种思想陷阱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世界市场——形而上学”、“所谓的自由世界贸易”、“经济上面临的问题是国际化而非全球化”、“风险戏剧”、“作为革命的无政治”、“单向思维神话”、“对灾难思想的批判”、“黑色保护主义”、“绿色保护主义”、“红色保护主义”。

首先,全球主义把新的复杂的全球性和全球化简化为单一经济领域,同时它还表现出单向思维,无限依赖世界市场,而所有其他领域都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从属地位。另外,世界社会被简化、歪曲成世界市场社会。从这种意义看,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是一维领域思想和行动的表现形式,即经济主义世界观。第二,全球主义提倡所谓的自由世界贸易,认为全球化经济最适合提高世界生活水平并且减少社会弊端。世界贸易激化了竞争并导致成本下降,最终大家都从中获利。但这里混淆了两

种不同的降低成本的方式：通过改善技术和组织管理提高经济效率，或者破坏人道的劳动和生产标准。第三，全球主义不仅把多领域全球化与单一经济领域全球化相互混淆，同时还把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国际化相互混淆。第四，全球主义的力量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事物本身，绝大部分来自导演威胁论：可能发生、一定发生、这种如果一就的假设关系统治一切。第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是一场高度政治化运动，然而它的表现完全是非政治的。作为革命的无政治！其思想是：人们不采取行动，而是贯彻世界市场原则，这些原则迫使社会福利国家和民主最小化。第六，要彻底反驳单向思维神话的思维定式和文化一致性论点。第七，要坚决批判灾难性思想。在第一次现代化向全球化阶段过渡时期，我们面对的是基础转型、形态转型，我们将迈向一个未知的全球化世界，这并不是“灾难”或“危机”。同时令欧洲感到震惊的大规模失业不是一场“危机”，因为返回到全日制工作已经成为幻想。同时这也不是一场“灾难”，因为由部分或全自动生产代替劳动能够给人们提供划时代的自由空间。因此人们必须打破传统观念，从政治上抓住这些自由空间并且不断发展它。第八，黑色保护主义者极端矛盾，一方面他们推崇民族国家思想，另一方面却用自由世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运动思想破坏民族国家。黑色保护主义在双重意义上相互矛盾：它破坏自己崇尚的社会，同时经济上是反生产的。第九，绿色保护主义与全球性生态危机相矛盾，它放弃了地方性考虑、全球性行动的政治杠杆。绿色保护主义者是明智的、政治的全球化赢家。但是由于他们轻率的反现代主义、倾向地区性并且惧怕与民族国家一起丧失环境政策的官僚制度协调杠杆，最后绿党政治家大都限制了自己的发展。第十，红色保护主义者又扬起阶级斗争外衣的尘沙，对他们来讲，“全球化”是“曾经是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在第四部分“应对全球化”中，针对全球主义的十种思想陷阱，贝克提出十种应对全球性和全球化的方案：“国际合作”、“跨国国家或‘相容主权’”、“按资分配”、“教育政策的新导向”、“跨国企业家是非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公民劳动联盟”、“继大众汽车出口国之后将出现什么？”